

戊戌維新運動時期的容閔和鄭觀應 兼論香山人探索晚清中國近代化的路徑

沈榮國*

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下詔“明定國是”，正式開啟近代中國政治變革的大門。一時間，國內有志之士風雲際會，紛紛以不同的姿態應對這場資產階級維新改良運動。其中，來自與澳門一水相隔之香山縣的容閔和鄭觀應尤其值得關注。本文分別梳理了他們在戊戌維新運動時期的言行，探索其背後的歷史因素，進而考察晚清中國近代化的路徑問題。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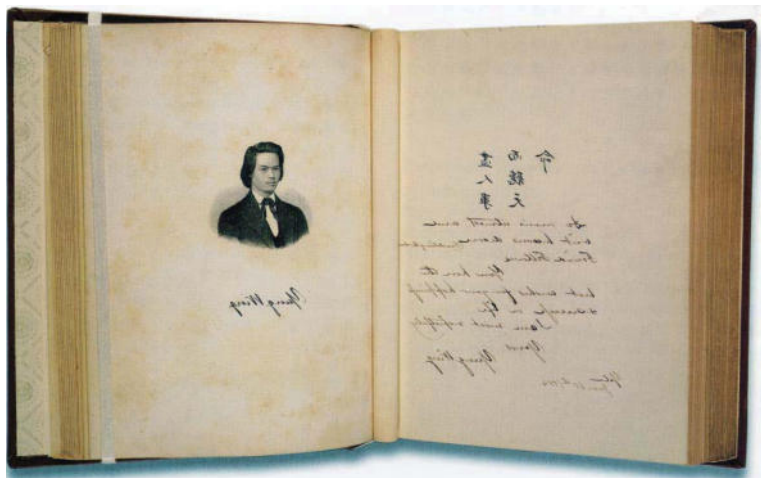
容閔（1828-1912），字達萌，號純甫，廣東省香山縣南屏村（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南屏鎮）人。1845年，七歲的容閔進入德國傳教士郭實臘夫人在澳門開辦的免費西塾學習，十三歲進入馬禮遜學校。1846年，主持馬禮遜學堂的勃朗牧師因病回國，意欲帶幾名中國學生去美國完成學業，容閔欣然隨之一道赴美，中國近代留學教育史就此翻開了第一頁。容閔到達美國後，先進入麻塞諸塞州的孟松學校讀書。三年以後考入耶魯大學。1854年，容閔順利完成耶魯大學學業，獲得文學士學位，成為最早系統接受西方新式教育並獲得正式學位的中國人。留學期間，容閔形成了“以西方之學術，灌輸於中國，使中國日趨於文明富強之境”⁽¹⁾的偉大信念，將實施其“願遣多數青年子弟遊學美國”⁽²⁾的留學計劃作為實現強國夢想的主要途徑。歸國後，容閔上下求索十數年，最後趁洋務運動之東風，促使清廷決定派

出幼童出洋留學，開近代中國官派留學教育之先河。同時，容閔在教育、工業、外交等洋務事宜中皆頗有作為，在譯書、辦報、購買槍炮和禁煙等方面也作出了努力和貢獻。

幼童留美事業夭折後，維新改良運動嶄露頭角，容閔逐漸由依附於“洋務”轉而置身於“維新”。1896年，容閔在上海“籌劃銀行、鐵路等策”⁽³⁾時，結識了在當地醞釀維新變法運動的康有為、梁啟超等人。他們對彼此的事業都特別欣賞，容閔的“銀行章程脫稿後，南海甚以為然，（……）嗣又擬鐵路六條，亦蒙南海稱賞”⁽⁴⁾。同時，梁啟超在給康有為的信函中也說：“容純甫在此見數次，非常人材也，可以為勝廣。”⁽⁵⁾可見，此時的容閔已經成為康梁等維新人士的重要盟友了。

1898年，“中國政治存亡危急之秋，適維新潮流澎湃而來”，“光緒帝受此奇異勢力之激動，遂奮起提倡維新之事業”。年已古稀的容閔“決議留在北京”，幾乎參與了康梁維新派所有活動

*沈榮國，山東臨清人，文史學者，主要從事近代中國留學史、珠澳地方史、嶺南祠堂文化、民國職業教育史、中外文化交流及近代中國人物研究。陸續發表學術論文十餘篇，參編著作一部，計近百萬字。現為《廣東祠堂》編輯部副總編、珠海容閔與留美幼童研究會研究室主任。



△ 容閔在耶魯大學親書的紀念冊（珠海市博物館資料室）



▷ 鄭觀應（自中山市博物館）

的策劃⁽⁶⁾，並竭力影響這場運動的方向。4月，康有為發起保國會，第一天容閔就到場表示支持。“百日維新”期間，康梁等人經常徵求容閔的意見，其在北京的寓所“一時幾變為維新黨領袖之會議場”⁽⁷⁾。此外，即如有些學者所言，容閔在變法前關於銀行、鐵路等各方面的設想實際上為維新派設計了一個以美國為依托進行全面改革的方案。康梁等人在容閔的幫助下，把容閔的計劃草擬成了奏章，欲利用美資成立大公司，全面變法。⁽⁸⁾康梁等維新派領袖鑒於“江蘇候補道容閔，少年遊學美國，壯歲又奉使差，久於美地，前後二十餘年。其為人樸誠忠信，行誼不苟，深為美人所敬信。若容閔往美召集，必有可成”⁽⁹⁾，故“薦容純甫熟悉美事，忠信可任借款”⁽¹⁰⁾。即計劃推薦容閔赴美借鉅款作為修築全國鐵路、練百萬精兵、購鐵艦百艘並於各地廣設新式學校和開銀行等統籌大局的費用，以便實施大規模的變法。

可見，戊戌維新運動時期，容閔不斷靠近康梁等維新派，在“百日維新”期間，他更是積極參與其中，甚至成為變法計劃的潛在制定者和預計的實踐者，可謂“百日維新”的重要參與者。變法失敗後，容閔後來回憶說：“予以素表同情於維新黨，寓所又為會議場之目，故亦犯隱匿黨

人之嫌，不得不遷移以逃生。乃出北京，赴上海，托跡租界中。”⁽¹¹⁾應該說，容閔似有意掩飾他在“百日維新”期間的實際作用。

二

其實，“同情於維新黨”、“犯隱匿黨人之嫌”之語言用在容閔的香山同鄉鄭觀應身上似更為合適。

鄭觀應（1842-1923），本名官應，字正翔，號陶齋，廣東省香山縣（今屬中山市）雍陌墟人。鄭觀應少年時代在父親鄭文瑞指導下接受早期儒學教育，1858年應童子試未中，“奉父命赴滬學商務”⁽¹²⁾。在上海，他先任職於寶順洋行，後成為生祥茶棧通事。1847年，“上海太古洋行創設輪船公司，聘為總理兼管棧房”⁽¹³⁾。1878年以後，鄭觀應陸續出任上海機器織布局總辦、上海電報局總辦、輪船招商局幫辦、總辦、開平煤礦粵局總辦等重要職務，為早期中國近代工業的初步發展做了很多實際工作，在一定程度上為維新變法運動營構了部分經濟基礎。

鄭觀應在推動中國近代經濟初步發展的同時，也不斷地探討中國救亡的其它道路，且陸續

將思考的結晶凝化到《易言》、《盛世危言》等著作中。透過這一系列著述，我們清晰地看到，和同時代的洋務人士僅僅致力於器物方面的細節末枝的改革不同，鄭觀應很早就把改革的觸角伸向政治領域。早在1870年代，面對鴉片貿易苦力販運等問題，年僅二十餘歲的鄭觀應明確提出中國應該“中西方之間的共通原則”即國際公法，以務實的態度與各國合作，有效地將這些新時代的事務管理起來。也就是說要求參照近代國家的法律和規則，改革清王朝的政府職能，使之順應時代的變遷而自覺實現近代化轉變。

19世紀80年代，鄭觀應在制度層面的改良思想更是觸及政治制度的核心，他在〈南遊日記〉中提到：

余平日歷查西人治國之本，體用兼備：育才於學堂，論政於議院，君民一體，上下同心，此其體；練兵、製器械、鐵路、電線等事，此其用。中國遺其體倣其用，所以事多扞格，難臻富強。⁽¹⁴⁾

在這裡，鄭觀應敏銳地指出當時洋務運動之所以效果不佳的根本原因在於“遺其體”，即僅學西方之器物，而未悉西方之體制，尤其是含蓄地指出了學習西方政治制度的核心——設議院，實行君主立憲制取代皇權專制的重要性。這實際上暗中否定了封建專制制度，進而打開了一扇通往徹底政治變革的大門。鄭觀應的這種思想在當時具有相當大的影響，甚至被彭玉麟、龔易圖、張樹聲等晚清高官所接受。⁽¹⁵⁾

1895年，甲午戰爭中國慘敗的事實，刺激了先進的中國人要學習日本改良維新以富強中國的思潮，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正式走上歷史舞臺，先後在北京、上海創辦強學會，引領維新變法運動潮流。此時的鄭觀應多次強調盡快設立議院的迫切性：“今日本行之勃然興起，步趨西國，凌侮中朝。而猶謂議院不可行哉？而猶謂中國可不亟行哉？”⁽¹⁶⁾這引起了康梁等人的關注和

欣賞，梁啟超編製《西學書目表》時專門把鄭觀應的《盛世危言》列入附卷⁽¹⁷⁾作為維新變法理論基石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據鄭觀應所言：“康長素先生在滬閱拙著時，已有此意。”⁽¹⁸⁾在思想相近的基礎上，鄭觀應和康梁等人在上海強學會期間有着相當密切的聯繫，康有為在上海的部分活動就是他經手安排並陪同進行的，鄭觀應積極擔當上海與北京強學會的聯繫工作，以致於有“諸人於滬上交涉為鄭陶齋”⁽¹⁹⁾之說。可見，鄭觀應稱得上是早期上海維新運動的骨幹分子。

1898年初，德國強租膠州灣，掀起了一股瓜分中國的狂潮，康梁等人主導的維新運動迅速走向高潮，出現了在中國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百日維新”。在這愛國、狂熱、悲憤等情緒混雜的時刻，鄭觀應沒有隨波逐流，而是冷靜下來理性地思考、面對現實。他沒有像上海強學會時期一樣遽然投身於“百日維新”，而是先試圖說服康梁等人糾正變法激情中的失誤。對此，他後來回憶說——

當康南海召見時，問弟政治能即變否？弟云：“事速則不達，恐於大局有損無益。譬如大指與尾指交，二、三、四指不能扶助，能舉重否？”弟所謂大指者即宣統（光緒），尾指即康南海。今不幸言中，亦勢所必然，非妄說也。⁽²⁰⁾

客觀地說，鄭觀應所言的確符合當時情況，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可惜，康有為沒有正視及採納鄭觀應的意見。

在試圖說服康有為等人失敗後，鄭觀應感到無奈和悲觀，暫時拒絕了光緒皇帝欲讓他參與變法的“內召之旨”。此即如他後來所言：“官應自愧學術荒陋，恐為羊公之鶴，轉負咎於師門。況大局如此，即由意外遭逢，亦擬藏拙不赴，以遂草茅之初志而已。”⁽²¹⁾不過，這不等於是鄭觀應完全置身於變法之外。他依舊時刻關注

變法的命運，等待合適機會間接暗中支持維新派。1898年9月，“百日維新”即將遭到扼殺之際，鄭觀應得悉伊藤博文和李提摩太即將到中國且有意出任變法期間的皇帝顧問時，他敏銳地意識到可以利用他們所代表的外國勢力做“二、三、四指”，以增強光緒皇帝和康有為等變法的力量，以挽狂瀾於未倒，便馬上致函給李提摩太，表示“願出北京舟車等費，欲求大駕赴京一行，將民間疾苦痛陳，應如何改良方合，條陳我政府，請英公使轉呈”⁽²²⁾，語言中明顯可見鄭觀應對維新變法命運的關注和擔憂之情，據此亦可知他對維新變法的真實態度。

“百日維新”最終以失敗告終後，康梁等維新人士被通緝。對此，鄭觀應痛惜之餘，盡力幫助落難的維新人士。他成功地勸告康有為的弟子們離開上海到澳門等清政府無法控制的安全地帶，並通過何廷光寄錢接濟康有為的親屬，即“茲寄上洋壹百元，祈代送其老親(康有為親屬)以表弟之微忱。(……)其旅滬之門弟子，弟已勸離滬。”⁽²³⁾同時，鄭觀應還暗中阻止盛宣懷等人緝拿梁啟超等維新人士，以便其順利安全離開。政變發生後第二天，與維新派有密切聯繫的鄭觀應得知梁啟超已經在日本得到庇護之後，才以實情密函盛宣懷——

敬密肅者：頃聞梁卓如扮日裝到滬，想小田切總領事必知確否，今日相見可詢之。不可說聞於何人，至禱！(……)閱後付丙。⁽²⁴⁾

對於這個密函，有的學者據以認定鄭觀應要置梁啟超於死地⁽²⁵⁾，更多的學者認為此尚不能成為鄭觀應反叛維新派、加害梁啟超的證據。⁽²⁶⁾筆者認為鄭觀應在此信函中不僅告訴盛宣懷有關梁啟超的行蹤，更強調梁啟超受到日本人保護的實情，意在用日本勢力涉入的事實讓盛宣懷知難而退，且要求盛宣懷燒燬信函以暗示加以保密，防止其他清廷官員知曉後對梁啟超不利。次日，盛宣懷收到上海道蔡斌要求協助緝拿維新派人士

的命令後，果然沒有盲目行動，更沒有把梁啟超的行蹤告訴蔡斌等人，梁啟超也因此躲過了這一劫。實踐和言論均能證明，鄭觀應的這個密函不僅不能說明他有加害梁啟超之用心，反而揭示了其有意在保護梁啟超並取得了預定效果。

三

戊戌維新運動是晚清中國近代化歷程中的重要座標，容閔和鄭觀應這兩個香山人在其間的言行有相似的地方，又有明顯的差異。在異同的背後，蘊涵了他們作為香山人探索及推動晚清中國近代化的不同路徑。

容閔和鄭觀應均出身於臨近澳門的香山縣。澳門在明朝中期成為葡萄牙人的據點，其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宗教等方面多照葡人社會文化理念出現西化的變革，成為遠東第一個初步實現近代化的飛地。在澳門附近的香山人近水樓臺先得月，成為中國率先沐浴歐風美雨而直接接觸西方近代文明、進而較早趨向近代化的地方。不過，香山縣各個地區、各階層民眾受澳門的影響程度不一，不同區域、不同層次的人在中西文化交流和固守鄉土傳統之間的選擇不一樣。與澳門僅有一水之隔的南屏一帶受西方文明影響較大，出生於此地的容閔家境貧寒，其父去世後“身後蕭條，家無擔石”⁽²⁷⁾，缺乏正規傳統儒學教育的家學根基和起碼的經濟實力。馬禮遜學校在澳門的設立為容閔打開了通往世界的道路，引導着他走上幼年便接受西方新式教育，進而留學海外的道路。而鄭觀應所在的雍陌墟離澳門雖不遠卻隔着山嶺荒野，受西方文明影響程度不如南屏。而鄭氏曾祖、祖父皆有相當的傳統文化素養，但“均不屑以尋常摘句為能”而棄儒從商。其父鄭文瑞早年“澹於進取，敝屣科名”⁽²⁸⁾，後到上海做買辦，在鄭觀應八歲時回鄉設帳授徒，宣講傳統文化，“嘗刻《訓俗良規》、《勸誠錄》等書，貽贈鄉里，或為人講解，聞者化之。”⁽²⁹⁾在這種背景下，早年的鄭觀應“自幼從海舶遍歷越南、

暹羅、新加坡等處，熟悉洋務”⁽³⁰⁾，同時在父親的指導下進行傳統儒學教育訓練，接受傳統文化薰陶，當其“年十七，小試不售，即奉嚴命赴滬學賈”⁽³¹⁾，走上買辦商人道路。

早年的不同經歷使他們在探索救國道路上各具特色。容閔率先跳出封建中國文化的禁錮，留學海外接受西方新式教育，經受美國社會的薰陶，形成了“以西方之學術，灌輸於中國，使中國日趨於文明富強之境”⁽³²⁾的信念，為中國近代化預先設置了一個外在的目標體系，即希望以美國文化為代表的西方文明改造中國，以使之成為與歐美列強並駕齊驅的富強國家。這成為他一生行動的基點，這個基點一開始就跨越了器物層面而直向以再造西方文明為指歸的全面近代化。後來，在他與太平天國、洋務派人士、維新志士合作時，其關注點都是圍繞這個目標，堅持利用時機提出與完善這個目標，不斷思考能否實現這個預定目標、如何實現這個目標，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嘔心瀝血鞠躬盡瘁。天平天國時期，他上書建言七策，初步描述了其藍圖，然而看到天平天國天王“洪秀全於應試落第後，得失心盛，殆成一種精神病。神智昏聩中……昏聩中構成之幻想，乃自信為真”，深陷一種自閉的宗教信仰狀態而不問政事；而其他領袖人物“品格與所籌劃，實未敢信其必成”，其軍隊“無賴之尤，既無軍隊紀律，復無宗教信仰，即使齊之以刑，不足禁其搶掠殺人之過惡”，斷言他們即使最後取得勝利，徹底推翻了清王朝，也不過是“一姓之廢興，於國體及政治上無重大改革之效果”⁽³³⁾，壓根沒可能幫他實現自己的目標藍圖。洋務運動期間，經歷天平天國教訓的容閔暫時收起其目標藍圖，致力於發展留學教育，試圖寄希望於眾多新的留洋人材共同努力實現之，同時在銀行、鐵路等方面提出系列的近代化建議。維新變法運動期間，離開中國十數年且年已古稀的容閔，從張之洞那裡失望歸來後已感到時不我待，急切地抓住了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提供的機會，直接跨過了變法是否成功的問題，而轉向變法成功後如何規劃才能實現

富強中國的問題，於是這才有了他積極參與“百日維新”的景象。

鄭觀應經商之餘密切關心國政民生，不斷探索救國道路。基於時代因素使然，鄭觀應在探索救國過程中，也學習吸收而且頻繁借鑒西方經驗，甚至呼籲不要僅學習西方之器物，更要學習西方的政治體制，成為最先將學習西方文化的觸角深入政治層面從而促進中國政治體制近代化的先知之一。但與容閔不同的是，鄭觀應的出發點是如何改變國內慘澹腐朽的衰敗情況，傾向於挽救中國於水火之中，而非意在致力於構建西式社會。其實，西學在終生未出過國門的鄭觀應那裡從來沒有成為內心的信仰和預先規劃的模版，商人的務實作風決定了西學在他那裡始終祇是解決中國問題的工具，即“對西洋之興趣，則集中於各國所以致富之原由”。據此，筆者認為我們應該將鄭觀應的“中體西用”、“道為本，器為末”中的“體”和“道”理解為能否解救中國當時困境的實用性。西學的運用要符合這種實用性，否則“世變無常，富強有道”⁽³⁴⁾，西學如果失去了解決中國問題的實用性，肯定會被鄭觀應毫不猶豫地淘汰掉。

正是由於鄭觀應看到了西學，尤其是西方政治體制對解決中國問題的實用性，他才能中肯地批評洋務運動，推動維新運動的到來，甚而積極參與早期維新運動。然而，鄭觀應畢竟不盲信西學，他的出發點在於解決國內的問題，這不僅是一個是否具有實用性的問題，更是一個是否具有可能性的問題。他審時度勢認為西方議院等政治體制在中國暫時沒有充分條件實施時，便冷靜地面對現實。這應該就是鄭觀應沒有廁身“百日維新”的原因所在。

容閔傾向於一種對外在文明的先天認同，進而充當了外部世界誘導中國走向近代化的歷史角色。而鄭觀應的探索則是晚清內部人士逐漸覺醒和蛻變的典型。他們所代表的兩條近代化路徑在維新變法運動時期交集起來了。康有為等人將容閔的近代化圖景寫入奏摺，轉化為中國歷史主流

事件的重要組成部分。容閔的外部誘導作用正式深入到中國高層和智識界，表面上實現了其預定目標。而維新變法運動宣導君主立憲，將改革的觸角深入政治核心領域，不僅初步實踐了鄭觀應的變法思想，亦是國內人士之覺醒和蛻變從鄭觀應等少數先知擴展到多數國人的重要表現。

然而，在這似乎實現了他們理想的時候，容閔鼎力支持的“百日維新”僅過了百餘天就以失敗告終，鄭觀應則提前看破紅塵，表現了無奈和消極的悲觀。這種矛盾的根源在於當時保守落後腐朽勢力的存在，其反動和頑固已成為晚清中國近代化發展的瓶頸。問題的解決祇能是打倒這些腐朽勢力，瓦解其存在的社會基礎。對此，新一代香山人孫中山和唐紹儀接過容閔、鄭觀應的歷史接力棒，一個在外領導反清革命，一個在國內消釋清廷統治的封建根基，終於推翻清朝統治，創建了亞洲第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中華民國，兩人亦分別出任首任總統和內閣總理，推動着中國近代化道路走向新里程。

【註】

- (1) (2) (3) (7) 容閔：《西學東漸記》，鐘淑河編：“走向世界叢書”第二冊，嶽麓書社1986年版，頁62；頁52；頁155；頁156。
- (4) 容閔：〈致木齋仁兄函〉，未刊稿，見《李盛鐸未刊函劄》。
- (5) (6) 轉引自劉中國、黃曉東：《容閔傳》，珠海出版社2003年版，頁154；頁453。
- (8) 參考孔祥吉：〈略論容閔對美國經驗的宣傳與推廣——以戊戌維新為中心〉，王遠明、顏澤賢：《百年千年——香山文化溯源與解讀》，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頁143-146。
- (9) 陳其璋：〈統籌全域請再向美借款以相牽制而策富強折〉，孔祥吉：《救亡圖存的藍圖——康有為變法奏議輯證》，聯合報系文化基金叢書1998年版，頁31。
- (10) 翦伯贊等編：《戊戌變法》第4冊，神州國光社1953年版，頁142。
- (11) 容閔：《西學東漸記》，鐘淑河編：“走向世界叢書”第二冊，嶽麓書社1986年版，頁156。
- (12) 鄭觀應：〈中華民國三年香山鄭慎餘堂侍鶴老人囑書〉，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頁1483。

- (13) 鄭觀應：〈覆考察商務大臣張弼士侍郎〉，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頁620。
- (14) 鄭觀應：〈南游日記〉，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頁967。
- (15) 參考易惠莉：《鄭觀應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頁338-340。
- (16) 鄭觀應：〈議院〉，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頁315。
- (17) 梁啟超：〈西學書目錄表〉，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頁454。
- (18) 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劄》（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頁298。
- (19) 轉引自湯志鈞著：《戊戌變法人物傳稿》，中華書局出版社1982年版，頁709。
- (20) 鄭觀應：〈致經君蓮珊書〉，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頁1165。
- (21) 鄭觀應：〈上皖撫鄧筱帥書〉，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頁361。
- (22) 鄭觀應：〈致英博士李提摩太書〉，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頁1166。
- (23) 康有為：〈致何君穗田書〉，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頁1166。
- (24) 鄭觀應：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七日〈鄭觀應致盛宣懷密函〉，《盛檔》（未刊資料）。
- (25) 武曦：〈鄭觀應與梁啟超、經元善——兼評其對戊戌變法的態度〉，《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1期。
- (26) 參考夏東元：〈略論鄭觀應在戊戌維新運動時期的矛盾表現〉，《天津社會科學》1984年第6期；易惠莉：《鄭觀應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頁560-561。
- (27) 容閔：《西學東漸記》，鐘淑河編：《走向世界叢書》第二冊，嶽麓書社1985年版，頁44。
- (28) 鄭觀應：〈先考榮祿大夫秀峰府君行狀〉，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頁1222-1223頁。
- (29) 〈鄭秀峰先生八旬開表徵詩啟〉，《申報》1882年9月16日。
- (30) 鄭觀應：〈彭剛直公密籌暗結暹羅襲取西貢密摺〉，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頁1516。
- (31) 鄭觀應：〈覆考察商務大臣張弼士侍郎〉，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頁619。
- (32) (33) 容閔：《西學東漸記》，鐘淑河編：“走向世界叢書”第二冊，嶽麓書社1986年版，頁62；頁95。
- (34) 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頁66。